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闻黎明

1945年7月初,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不仅是中间党派与中共最高领导集体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中间党派在抗战期间为调解国共矛盾进行的一次最重要努力。由于这次访问达成的《会谈纪要》体现了第三方面与中共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上的共识,所以史学界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是,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结果并非就是访问的最初动机。那么,六参政员延安之行的初衷是什么呢,这个目的为什么没能实现呢?这便是本文所欲探讨的中心。

—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的出发点是为了调解国共矛盾,因此对1945年年初以来国共间的政治分歧做以回顾,显然有所必要。

众所周知,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正式提出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以“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和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演讲中阐述了上述建议的具体步骤与方法,表明中共决策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多局限于解决国共间的悬案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这样,原本头绪多端的国共分歧,便聚焦在要不要

建立联合政府和要不要召开党派会议两个问题上。

11月7日,来华调停国共矛盾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三天后赫氏与中共领导人签订了“五条协定草案”(即《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赫尔利之行是实现美国远东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设法劝说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诱使中共参加政府并放弃独立武装,最终建立起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本着这个战略意图,“五条协定草案”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是,这个草案遭到蒋介石的反对,随后国民党提出三条反建议,除了强调中共服从政府和交出军队外,闭口不谈联合政府问题。双方距离太远,随赫氏来渝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7日返回延安。

勿庸讳言,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核心,是为了争取获得与国民党平等决策的政治权力。而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深知中共建议的实质在于通过改组政府来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此对于任何有可能染指其政权的建议都不可能接受。不过,蒋介石也意识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在野党派的参政要求已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完全漠视这种舆论,将不可避免丧失政治主动权。于是,蒋介石苦心积虑设计出一个以攻为守的谋略,遂于1945年元旦演词中宣布将准备召开国民大会,以便“还政于民”。这真是一箭双雕,它既撇开了中共建议,又貌似将按照“民主程序”一步到位地将“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归政于全国的国民”^①。

当然,蒋介石很清楚,长期以来在野党派并不反对召开国民大

① 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重庆《伙公报》,1945年1月1日。

会,而是反对由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因此,他也不得不做另一手准备,即打算在行政院内成立一个7人至9人组成之具有战时内阁性质的“战时行政会议”;以此延揽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达到“容纳中共所谓‘联合政府’之要求而谋中共问题之解决”这一目的^①。蒋介石认为,召开国民大会还有许多程序上的纠纷未能解决,而以成立战时行政会议来实现“统一”,不仅比较实际,而且也是对中共的一种重大让步。基于这一点,元旦过后蒋匆匆将战时行政会议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孙科、王宠惠、王世杰三人。1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将战时行政会议改名“战时政务委员会”;并通过《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在赫尔利请求下重返重庆。周此次来渝是力争改变以往国共秘密谈判的方式,代表中共向国民政府、国民党、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②,因此当宋子文问及中共对于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的态度时,周立即表示“此次来重庆,非继续国共两党之会议,而是为了召开党派会议及讨论共同纲领”^③。周的态度十分了然,那就是“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下之‘战时内阁’”,继续坚持“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并宣告‘党治’之废除”,然后成立“联合政府”^④。中共这一立场不仅得到中间党派的理解,也受到国民党内某些高层人士的同情。孙科表示赞成召开“国是会议”,并且“痛斥国民党过去之错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4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② 《周恩来赴渝前的声明》(1945年1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4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4日。

误,谓其反共而走入法西斯途径”,“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①。如此一来,蒋介石打算以战时内阁取代改组政府的企图更难行得通了,结果战时政务委员会始终也未能成立。

中共十分了解国民党在成立联合政府上的重重疑虑,因而周恩来拒绝战时内阁方案的同时,也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特别强调愿本着互信互让精神解决一切问题。周解释说,党派会议仍由国民政府召集,联合政府亦名国民政府,只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宪法上之政府。^②当时,中共的目的虽然是成立改组政府,但鉴于改组政府要通过党派会议协商解决,因此中共的努力重心侧重于促进召开党派会议方面。正因如此:当周感觉到王世杰、张治中并未坚持反对召开党派会议时,便及时提出“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要点为:会议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专政、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③。上述数点,构成了中共在这次谈判中的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王世杰在代表国民党草拟的新协议草案中,也设计了一个“政治咨询会议”;其办法是“召集一十余人之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并约其他无党无派人士数人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④在双方交换各自草案的会谈中,王世杰尽管坚持政府不能同意结束一党统治,但也表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8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1月28日,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2月2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示可以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须将党派会议改个名称),同时还希望中共能够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

周恩来看过王的草案,感到它虽然没有改组政府的明确文字,但却有所松动,故尔同意向延安转呈^①。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周甚至估计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方案^②。然而,延安接到周电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怀疑国民党是不是又在玩弄花招,因为只要国民党保留控制政府的权力,那么任何改头换面的方案都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为此,毛泽东复电周,要他明白告诉国民党及中间党派,除了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外,中共碍难参加政府^③。

中共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立场,使蒋介石为时过晚的妥协失去了意义。2月13日,蒋接见周恩来时,傲慢地指责建立联合政府是要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声称除了成立“政治咨询委员会”外,其他任何形式他都不能接受。蒋的态度更加证明了国民党所欲建立的任何机构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毫无决定权的摆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离渝。2月14日,王世杰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声明政府在政治及军事团结问题上寻找到过渡办法,并对中共做出了若干重要让步,意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一边。针对王的声明,周恩来次日亦发表声明,谴责王世杰的话“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为国民党的方案只是“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至于政治咨询会议,预定的主要内容也不外乎“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2月2日。

③ 《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2月3日。

这样的谈判毫无结果,任何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意义^①。

王世杰、周恩来的声明将国共分歧再次公诸于世,国统区进步人士对国民党玩弄政治权术的态度深为不满,纷纷要求立即邀集各党各派及各方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是,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有人还强调指出:克里米亚声明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这就是“以民主方式解决国内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它不仅已经运用于解决波兰、南斯拉夫问题,而且也是解决“一切其他小国国内争端的原则”,因此理所应当“应用于中国”。何况“谅解与团结必须在平等地位的会议协商中获得,不能用发命令与受命的方式”,而“党派合作,必采用联合政府方式,真正做到开放政权”。^②

但是,蒋介石深知成立联合政府的结果必将加强中共的政治势力,他曾对赫尔利说: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③。赫尔利有些不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不过是允许“插进一只脚趾”,蒋立刻说“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很清楚,蒋介石的所谓灵活性,最大限度仅仅是允许中共和中间党派参加政府,而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为各党派平等的联合政府,则是万万不能许可的。本着这个既定方针,蒋介石3月1日对宪政实施协进会发表演说时,继续声言提议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表示决意将此问题及其他宪政问题付诸第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审议。蒋介石的演说进一步证明国民党抛出战时内阁和召开国民大会方案的

① 《周恩来离渝前的声明》(1945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28页。

② 罗隆基:《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民主周刊》第1卷第10期,1945年2月24日。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目的,绝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进程,而是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来,美国学者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亦尖锐指出“这一纲领的意义在于国民大会将完全受国民党控制”。^①

中共获悉蒋介石的演说后,立刻做出反应,指出这必将使国共商谈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因而对国民党所拟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亦无须答复。^②与此同时,中共针锋相对地公开了酝酿数月的抗衡方案。3月15日,中共发出《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它指出:国民党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必然是“一党包办的、具有分裂性质的御用猪仔国会”,而中共“所主张的国民大会,是要在国土恢复、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等条件之下,实行全民无拘束的普选,才能实现”。由于“这些条件必须联合政府才能保障其实行,而国民党专制政府是绝对不会实行”,因此中央决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各解放区及全中国人民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使其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同时“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③

中共的对抗措施使蒋介石万分恼怒,他决心不再理睬。5月14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蒋介石交议之《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样,国共矛盾似乎走到了近于摊牌的地步。

①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3月7日。

③ 《中央关于国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62—63页。

二

纵观当时的国内形势,可以说业已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左右政治走向,以民主同盟为首的中间党派起影响作用的基本格局。而国共的尖锐对立,又愈加突出了中间党派的地位。作为两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来说,哪一极能够获得中间党派特别是民主同盟的同情与支持,天平就会向这一极倾斜。这种客观现实注定了民主同盟必然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

尚在1945年年初国民党酝酿成立战时行政会议时,受命起草组织条例的王世杰根据自己对中共和民盟的多年观察,不相信两者能接受这一方案,因此直至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讨论此事的前一天,他还忧心忡忡地向蒋表示,“如中共及其他党派均不参加,则是否实行此项计划,似尚须考虑”。^①1月中旬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后,王仍顾虑重重地“提议暂缓对外发表”,主张“先向各党派作一度接洽”。^②王的担心与蒋不谋而合,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战时政务委员会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民主同盟肯不肯参加。当时,国民党的一系列穿梭活动,首先是围绕争取民主同盟进行的。

对于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民主同盟,国民党的争取重心没有必要放在被视为中共外围组织的救国会、第三党身上,它的分化工作是从青年党开始的。1945年1月15日下午王世杰约见青年党党魁之一的左舜生,“促请中国青年党及国家社会党推荐二人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但是,左出于某种顾虑,“颇不赞同单独参加”,以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4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5日。

致王认为左与中共有默契，“严词促其采取独立的立场，并谓各党派参加政府，既为左等素日所倡议”。^①与此同时，王世杰还致电成都的张群，要其就近催促青年党另一党魁李璜考虑该党单独参加。^②国民党的第二个目标本应是国家社会党，但该党领袖张君勱正在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于是比较折衷的中华职教社核心人物黄炎培便成为争取的另一个对象。可是，黄也存在与左同样的顾虑，他向王世杰、邵力子声明自己“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且是发起人”^③，言外之意就是不便单独行动。左、黄的态度令王世杰气恼，他“责斥民主同盟不应随时附和中共，忽视其素所主张统一与团结”。^④

王世杰的责难不能说没有道理。抗战以来，中间党派无数次表示过强烈的参政要求，但为什么此时又拒绝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呢？究其原因也许有多种，不过说到底恐怕还是取决于中共的态度。

如前所述，中共也对中间党派展开了工作。1月25日，周恩来来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向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范朴斋及郭沫若等报告了中共的主张，同时交换了对党派会议的看法。其后，周还向马寅初、柳亚子、吴蕴初、刘鸿生、章乃器、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胡西园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和产业界人士申述了同一态度。周的表态赢得了广泛同情，这是造成战时政务委员会始终未能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恩来2月16日的离渝，表明国共关系已又一次陷入对峙状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5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6日。

③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1月27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7日。

态。一方面,国民党决意操纵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通过召集国民大会的决议;另一方面,中共虽然口头上表示解放联合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实际上则试探能否通过它来间接取代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引起中间党派的高度紧张。应当承认,在政治民主化的程序上,中间党派与中共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它又不能不承认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占据着正统地位这一现实。这样,中间党派的最大能量,恐怕只能是揣摸双方的心态、转圜于两极之间,继之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①因此,当国共关系再次僵持不下之际,中间党派虽然拿不出缩小双方分歧的切实办法,但有一种努力则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如何要使国共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怀着这一动机,黄炎培、李璜曾趁着周恩来因飞机故障未能离渝的15日晚上,特邀周与王世杰商讨了两个半小时。这种补救式的会谈不可能产生什么效力,黄除了力主国共分歧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前能够初步解决、坚请周回延安后尽快返渝外^②,并未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不过,黄炎培的精神让人感动,他在2月21日郭沫若、王若飞召集的漫谈克里米亚会议和国内团结问题的会议上,继续呼吁以公意电请周恩来返渝。^③

敦劝国共恢复谈判问题,在周恩来离渝时便提了出来,但直到1945年3月底以后才显得比较突出。鉴于中共决定派人参加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中间党派好象受到某种启发,以为可以援例缓和国共关系。3月31日,德高望重的褚辅成出面了。这天,褚辅成与黄炎培、王云五、冷 商谈时局问题,议定宴请即将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时再做进一步调解。4月2日,褚、黄、王、冷联合

① 黄炎培语,转引自《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

②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2月15日。

③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2月21日。

宴请出席联合国代表李璜、吴贻芳、胡霖及孙科、邵力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王若飞等。席间，诸人纷纷“强调继续协商之必要”，并请王若飞“以公意电延安，劝周恩来能够5日与中共出席联合国的代表董必武一同来渝”。^①数日后，褚辅成、黄炎培在张治中为欢送董必武前往旧金山的饯行宴会上，又一次提出“继续协商问题”。^②

然而，就在中间党派奔走斡旋之时，国民党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这种结局虽然加深了调解者的困难，不过由于德国法西斯已于5月8日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覆亡也只是早晚之事，故黄炎培21日复向王若飞恳求恢复中断两个月的国共谈判。现在看来，5月25日很可能是诸参政员访问延安动议的起点。这天，褚辅成邀约王若飞、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 磋商恢复国共商谈办法，除了3月31日已经露面的王云五外，这次还特别邀请了傅斯年。说到王、傅二人，就不能不回溯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所通过的组织延安视察团决议。

自林伯渠、张治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后，社会关注焦点随即集中在报告的内容与意义方面，以致淡化了与此事相关的王云五、胡霖。事实上，要求国共报告谈判情况的建议正是王、胡两人提出来的。王云五说：“本席以参政员资格，在开会前一天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团，请求转请政府把和中共商谈的经过和结果向大会报告。”^③胡霖亦说“本会开会的时候，本席同王

①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4月2日。

②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4月7日。

③ 王云五：《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5页。

参政员云五发起,要求主席团向政府商呈在大会公开报告与中共商谈经过”。胡霖还强调:“发动这个提议,虽只是我们两个人,但是本席声明,绝对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因为背后有许多人要知道这个事情。”^①

当时,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进行的谈判已进行了四个半月,但内情一直秘而未宣,这使中间党派多有不满,因此王、胡建议能被参政会接受,人们不免有些意外和兴奋,而王、胡听罢林伯渠、张治中的报告后更是十分感慨。当时,王即席发表意见,说到他二人提出建议时有三个动机,即:“第一,本会以团结全国力量为最大任务,对于任何阻碍团结的因素都不能不想办法去消除。第二,现在已经接近抗战最紧张的关头,当然需要集中全国力量,尤其是兵力来抗战。我们知道,中共方面,是拥有相当的军队,同时政府在防护地区也保有相当的部队,假如团结问题能早日解决,这两部分力量,都可以用在抗战和反攻上面。第三,本会同人都人民代表,我们对于执政的国民党,一个很有力量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不能结合携手,这点是我们所最关怀的。”^②胡霖在谈感受时,亦表示深盼国共能在“政权公开”和“军令统一”两个问题上都能本着互让精神加速商讨。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前,大会主席团提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并推荐为促成国共报告而做出努力的王云五、胡霖及与冷、傅斯年、陶孟和为视察团团员。这个提议经大会讨论通过后,社会舆论均持欢迎态度,并认为“冷、胡、王、傅、陶五参政员在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夙具时望,且无党派关系”,故“全体参政员相信五

① 胡霖:《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69页。

② 王云五:《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65页。

氏必能完成使命,以加强全国之统一团结”。^① 据此,可知5月25日褚辅成邀请王云五、傅斯年参与磋商,显然考虑到参政会决议这个因素。至于这天究竟商谈了些什么,未见媒体披露,仅知“提出恢复国共商谈办法”。^② 很可能就在这天的会谈中,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三人力主“中共问题政府应继续与延安谈判”,王世杰不但表示赞成,进而提出“不妨任延安视察团傅斯年、王云五诸君赴延安一行”。次日,王世杰将此意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听了“亦以为然”。^③ 由此言推测,访问延安之事很可能还是王世杰首先提出来的。

访问延安绝非轻率之举,鉴于中共已经表示将拒绝出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的四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对王世杰的意见颇为重视,反复斟酌数日。6月1日,蒋招宴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王云五等,席间表示对发起促成国共商谈问题并无成见,若各位要给延安去电,可交张治中拍发。听了这个暗示,当场决定由褚等先“电延安询其态度”。^④ 会后,黄炎培、傅斯年赶拟了一份电稿,次日约褚、左、章、冷最后敲定了电文,这便是“已冬电”的由来。“已冬电”6月6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

三

目前保留的“已冬电”有三种版本,即6月1日黄傅拟稿、6月

① 《中共问题商谈经过发表,参政会决组延安视察团》,重庆《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

②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5月25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26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1日。

23日《新华日报》消息稿、6月30日《解放日报》消息稿。《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所引电文除个别文字外基本相同，兹录前者如下：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褚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兹同仁鉴于国内国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①

黄炎培日记所记录者为：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近褚辅成集同人会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托王若飞转达，计鉴及。兹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不惟抗战得早获胜利，建国新猷，亦基于此。敬掬公意，伫盼明教。褚辅成、黄炎培、冷、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②

以上两电基本精神虽然一致，但细加辨析至少有两处修正，《新华日报》稿一是加入了“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一语，强调这绝非七人之意，是参政会多数人的意见；二是把“促成团结”改作“从速完成团结”，加强了语气。此两处改动很可能是褚辅成等6月2日集议时对黄傅拟稿所进行的文字修饰，以便加重反映其急切心情。不过，三个版本的“已冬电”中，都未言及访问延安。

尽管“已冬电”并未涉及到访问延安问题，但是中共肯定已从

①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来电，欢迎褚辅成黄炎培诸先生赴延安》，《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②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1日。

参加5月25日会谈的王若飞处获得了信息。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收到王的报告,延安也很自然地与三届三次参政会关于组织延安视察团的决议联系起来。唯有如此,中共才能形成邀请七参政员前来访问的意见。

走笔至此,有必要对中共在对待参政会派员来延问题上的前后态度,做以简要追述。1944年9月19日,中共曾就参政会组织延安视察团一事公开表示意见,即首先“仍希望张(治中)、王(世杰)二氏来延视察与谈判”,其次才说“至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交换意见,是很好的,我们表示欢迎”。^①很明显,中共认为谈判需要有实质性的对手,参政会延安视察团则很难起到这种作用。另外,中共对三届三次参政会决议不能不说存在疑窦,由此推之,对褚辅成等人动机也不能不有所戒心。可以说,中共接到“已冬电”时也不免意外,甚至可能推测这会不会又是国民党策划的一个计谋。

不论中共是怎样估计的,加之中共正忙于召开七大,总之接到“已冬电”10天后才于16日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再于18日对七参政员发出复电。复电除谴责国民党执意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外,还表示“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的话,中共则“无不乐于商谈”,并欢迎“诸公惠临延安赐教”。

不难看出,如果说9个月前对参政会延安视察团的态度还较为笼统的话,那么此时则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条件或前提。中共的这个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是由于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

① 《欲挽救目前时局的危机必须改组政府及统帅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解放日报》，1944年9月20日。

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①对于具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代表性的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先打一下预防针倒是很有必要的。

延安的复电使力欲争取主动的蒋介石反而陷于被动了。当初,蒋之同意中间人士出面的主要的动机,不外乎是想利用他们劝说中共出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的四届一次参政会。以蒋介石的城府而言,不可能没有估计到中共的强硬态度,充其量他不过是打算做出个无须代价的姿态,试探中共也罢,敷衍中间党派也罢,反正自己在棋盘上占了先手。然而,想不到中共真的发来请帖,这倒不知该如何应付了,结果直到接到复电三天后,七参政员才在孙科处看到复电。

这回轮到七参政员惊讶了。黄炎培说,他们发出“已冬电”的初意,仅仅是出于“促成国共商谈”和“造出和谐空气”的愿望,并未“预备提出什么主张”,现在“延安要我们去,倒需要认真考虑一下”。^②从这话分析,好象他们起初还没有访问延安的思想准备。但无论怎样,中共毕竟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到延安后究竟该谈些什么呢,这倒使人颇费思索。事情很明显,自3月国共商谈中断以来国共分歧一直围绕在是召开党派会议还是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上,如果国共商谈未恢复前便召开国民大会,就“可能被认为某方面的国民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可能被认为某方面的宪法”,这样一来事情“就僵了”。反之,如果国民党不停止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那么

① 金城:《七参政员延安去来》,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22页。

② 黄炎培:《延安归来》,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恐于商谈的进行上,也将受到影响”。^①可见,国民大会问题若不能解决,不仅国共恢复商谈毫无意义,七参政员访问延安亦无任何必要。

这个棘手问题确实难以解决,七人想来思去,决定函请邵力子代陈蒋介石“指示方针”。^②与此同时,他们在磋商中也形成了三条共识: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这些意见,由左舜生起草成一函,仍欲请邵力子代陈。大家认为,只有蒋同意这三条,他们方可启程。^③言外之意,他们能否赴延安要根据蒋能否同意这三条的态度才能决定。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自认为揣摸到蒋介石心思的王世杰看了三条意见后,不但拒绝转呈,还说“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在诸人心目中,王世杰是能在蒋介石面前陈述甚至敢于坚持独立意见的高参,连这样的人都说不行,看来“延安行作罢是了”。不过,他们还不太甘心,旋访赫尔利。但赫除了表示可以提供飞机外,关心的是自己能否重新介入谈判。面对赫氏的态度,有人提出干脆散伙算了。事到此时,唯有黄炎培认为“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撞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黄不肯放弃努力,主张面蒋力陈。下午,七人一起见蒋,由褚辅成代表报告,不知是王世杰上午的话挫伤了他们的底气,还是担心对蒋刺激,总之见面时并没有拿出信函,谈话也只保留了原先商定的“政府召集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两条,把第三条“政府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舍去了。眼看参政会开幕

①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65页。

②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1日。

③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6日。

之期日益迫近的蒋介石这时也很着急,故表示自己没有成见,仅说“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①“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黄炎培仍有些顾虑。“辛苦!辛苦!”蒋介石应付道。^②这把上方宝剑仿佛是副定心丸,褚辅成拍案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这样,终于确定7月1日启程。

不过,7月1日乘美国飞机赴延安的参政员只有六人,行前王云五以身体欠佳为由没能启程。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因为10个月前主动建议国共公开谈判经过且被推为延安视察团团员的王云五,是七人中最不该临阵打退堂鼓的。王之所以临阵脱逃的真实原因,是由于他深感无法完成访延的最主要任务。

那么,这次访延最主要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大多介绍的十分笼统,或云“协助调解两党关系”,或云“与中共商国是”,其言使人不得要领。诚然,根据目前的材料,蒋介石似乎并未给七参政员规定硬性任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使命,实际上蒋至少有以下两项意图:

首先,说服中共接受政治咨询会议。中共“已冬电”发出后,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曾十分忧虑,以至失眠。因为陈就七参政员访问延安之事向蒋请示时,蒋表示“愿与共党及各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商谈”,但“不用党派会议名称,而用政治咨询会名义行之”^③,这说明蒋的脑子里始终没有放弃成立政治咨询委员会的念头。陈布雷深知在这一点上,中间党派与中共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此一来,势必失去多数中间人士的同情,岂不弄巧成拙,帮中共扩

①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7日。

② 黄炎培:《延安去》(诗),《国民参政会资料》,第500页。

③ 公安部档案室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6月29日,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大影响了。这种担心不止陈布雷一人，六参政员赴延前一天，王世杰也不太放心，为此专访王云五、褚辅成、傅斯年，特别暗示“谓彼等赴延安，亦宜主张国共续谈，不宜自提主张，免使政府陷于困难”。^①不过，这一点并未被出访者接受，所以后来褚辅成等方能与中共在“停开国民大会”和“召集政治会议”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由是也引起王世杰的不满。^②

其次，设法劝说中共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出现在四届一次参政会即将召开的前夕，这就不能不认为带有劝说中共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用意。6月27日七参政员面蒋时，蒋曾保证国民大会问题不会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做出硬性决定，甚至说“倘以国民党在参政会居多数，而借此解决问题，国民党不该做，也不做的”。^③有的著作中还说，当时蒋还“要求七人一一表态，直至七人都表示愿立即前往延安后，会见始告结束”。^④蒋的这番举动，再好不过地表现了欲以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共出席参政会的急切心态。其实，外间对蒋的苦心亦窥视得十分清楚，《大公报》便直言不讳地说：此次延安之行“用心自在促进团结，同时也敦促中共参政员来重庆，出席本月7日开幕之第四届参政会”；故希望中共看在这些“高龄体弱”且“盛暑长途”老先生的面子上，“请几位中共参政员陪他们回重庆”。^⑤其实，这一点并非蒋介石一厢情愿，可以说同样是六参政员本身认同的最主要的出访目的。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30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6日。

③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7日。

④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⑤ 《六参政员赴延安》，重庆《大公报》社评，1945年7月3日。

上述不难看出,如把六参政员视作一个使团的话,那么尽管它的使命具有相当弹性,却也不能说不够明确。王云五打退堂鼓的原因,应当是既然达不到目的,就不如不去,这可谓是上上策。王云五的自传《廬八十自述》,对其从政经历记录甚详,却闭口不谈这段事,可见实有难言之隐。

四

对于依赖新闻媒体了解形势的人来说,六参政员赴延安肯定会让其感到吃惊。虽然1945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共、中间党派之间频频接触,可不知是国民党有意淡化中共问题,还是媒体对敏感问题心有余悸,总之6月底以前重庆除《新华日报》外,其他主要报纸对中间党派的调停活动,包括七参政员“已冬电”及中共复电,均未见任何披露。

中共对待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的宣传基调,并非象今天人们印象中那样高。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留渝的王若飞最晚也应于6月1日获悉“已冬电”,但《新华日报》仿佛是等待延安指示,故迟至23日才发布消息。在延安,“已冬电”与中共复电是在六参政员赴延的前一天才同时刊登于《解放日报》的。六参政员抵延后,中共宣传也颇有分寸,延安除以显著位置介绍中共举行的欢迎宴会外,对他们在延的其他活动则未予报导,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不过,延安的接待工作规格极高,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而且六参政员访问期间,每天都有中共高层领导相陪。

六参政员在延安的五天感受已人所皆知。返渝后他们利用不同场合介绍了各自感想,特别是黄炎培《延安归来》对大后方人民进一步了解民主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气象具有积极意义。史学界对

这次访问的评价,主要着眼于此。^①但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全面考察,除了分析客观效果外,还应考虑主观出发点。对于六参政员访问延安这一事件来说,出访的使命究竟完成的怎样,是无论如何不应回避的。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它没有取得成功。

7月2日,在中共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黄炎培说他此次来延有两个目的,“正目的”是促成全国团结,“副目的”则是想来看看延安,以实现多年的愿望;左舜生的讲话,主要强调的也是民主与团结的关系。^②两人发言都是场面上讲的较为抽象的话,但如果对“促成全国团结”做进一步诠释,虽然可以说当务之急是恢复谈判,但也隐含地表达了希望中共能在参政会上与大家共同讨论国民大会问题这一意向。

事实上,敦请中共出席参政会这个问题虽然十分敏感,却不可能轻易绕过去。黄炎培回忆说,7月2日的首次会谈,主要是六参政员叙述来意与对大局的看法,当谈到恢复国共谈判一事时,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③仔细推敲黄的回忆,不难想象正是六参政员婉转述说了“正目的”之后,方引出了毛的这番话。既然中共再次表明了态度,再旧事重提就未免愚蠢,所以7月3日的第二次会谈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了,却唯独没有涉及是否出席参政会事。7月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时,主题已经转移到会谈纪要方面了。到了

① 如姜平在《黄炎培访问延安与延安归来》的出版中说:黄炎培“回到重庆后,为了将长期遭到歪曲宣传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国统区人民,他又不辞劳苦写出了《延安归来》一书,冒险出版发行,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见朱宗震、陈传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这种观点代表了史学界在六参政员访问延安问题上的基本评价。

② 《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褚辅成等六先生》,《解放日报》,1945年7月3日。

③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84页。

这种时候,即使六参政员心里还能想着使命,也不得不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下去。结果,他们只能抱着不是“第三者”,不是“调人”,不是“中证”的念头,满足于怀着“良心的使命”和“主人翁的身份”办事便足以自慰了^①。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成果,除了对中共提出只有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这一大前提下才能“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的主张表示理解外,最重要者是与中共就“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与“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这些与行前商定的劝请中共出席参政会这一任务,却毫不相干。六参政员返渝后,有人曾特别提出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问题。黄炎培承认“这点在延安并未提及”,继之模棱两可地解释说,“如果从商谈而获得团结,根本上得到解决,枝叶自不成问题”。^②这种回答方式,抛开个人而就使团来说,证明他们没有完成使命。

那么,作为一个使团,为什么没能完成其使命呢?究其原因,首先是六人本来便分属不同派别,政见并非一致,亦无人肯对使命负责。其次,与中共达成的两点共识,实际上就是行前向蒋介石提出的“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两大赴延前提。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即民盟内部的分歧对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 起着掣肘作用。

大约6月中下旬,黄炎培、冷 、左舜生、章伯钧将赴延安的消息传到昆明,令民盟云南省支部大为不解。该支部立即召开专门会议,一致认为民盟不应替国民党作说客。鉴于黄等行期将至,该支部特派常任侠持函赶往重庆,向民盟中央明确表示态度,希望阻止

① 黄炎培:《延安去》(诗),《国民参政会资料》,第502页。

②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70页。

南京慰安妇与慰安所.....	经盛鸿(191)
关于上海四个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苏智良(200)

· 书评 ·

一份来自加害者的证言 ——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评介.....	孙宅巍(208)
大型画册《花冈事件》评介.....	何天义(214)

· 问题讨论 ·

对日本强掳输出华北强制劳工 人数考证问题的一点看法.....	居之芬(217)
-----------------------------------	-----------

· 译文 ·

洗劫南京.....	[美] 约翰· 迈罗尼(219)
-----------	--------------------

· 综述与学术信息 ·

中日军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步 平(225)
在日本举行的“日中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国际研讨会”综述.....	孙金科(236)
日军在华细菌战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沪举行.....	邵 雍(241)
《花冈暴动》画册首发式暨声援东史郎 座谈会综述.....	罗存康(243)
中国慰安妇研究问题中心成立.....	本 刊(247)
柳州图书馆翻译整理出一批日文图书.....	本 刊(248)
· 抗日战争纪念地纪念馆 ·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徐 臣(250)
书讯.....	(253)

本期出版时间: 1999 年 5 月 26 日